

冬寿墓莲花纹研究

王飞峰

(韩国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 世宗市, 339-700)

冬寿墓又名安岳3号墓,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357年)高句丽壁画墓。冬寿墓也是朝鲜解放(1945年)后发现的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壁画墓,不但内容丰富、绘画严谨,而且壁画内容与这一时期中国关系密切,因此材料发表后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国出现了与冬寿墓相关的一系列论文。同时各国学者的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特点,中国学者的研究着重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学者以研究铭文为主,朝韩学者的论文多强调墓主人不是冬寿而是高句丽国王(美川王或故国原王)。十六国时期莲花纹已经被认为是具有佛教含义的纹样,因此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引发了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两个重要的问题: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何时出现。

一、冬寿墓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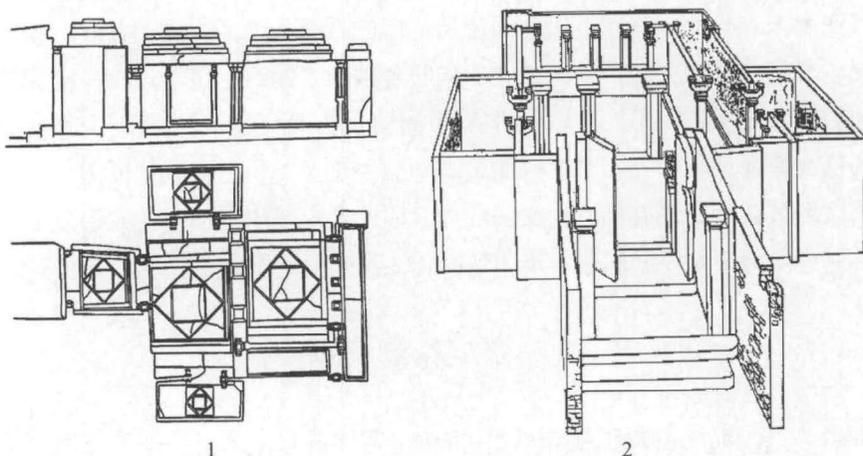
冬寿墓为典型高句丽封土壁画墓^[1],位于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或译为五局里,以前称黄海道安岳郡安岳面俞雪里),宿白先生根据墓中题记首先确认墓主人为冬寿^[2],因此中国学者多称其为冬寿墓。因其在安岳古墓群中编号为3号墓,又称安岳3号墓。冬寿墓于1949年4月初发现,4月13日~15日朝鲜文化遗物保存委员会和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初步调查,后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停止,1957年5月7日~15日朝鲜科学院考古学及民俗学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再次考察和发掘,1958年出版了报告^[3]。冬寿墓封土为覆斗形,其中南北长33米,东西宽30米,高6米,墓葬结构是用石板砌筑的多室墓,南北向,包括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前室两侧的东侧室和西侧室,后室北侧的北回廊和东侧的东回廊,前、后墓室顶部均为叠涩形成的天井。其中甬道长2.17米、宽2.12米、高3.48米,前室长4.88米、宽2.73米、高3.48米,后室长3.80米、宽3.32米、高2.8米,东侧室长2.99米、宽1.22~1.27米、高2.97米,西侧室长3.13~3.23米、宽1.7米、高2.75米,东回廊长4.79米、宽0.87米、高2.5米,北回廊长5.34米、宽0.69米、高2.5米。冬寿墓平、剖面图及结构示意图见图一。

墓葬内部遍绘壁画,其中冬寿及其夫人像分别绘于西侧室的西壁和南壁,壁画内容主要有出行图、乐舞图、角抵图、炊煮图、汲水图、马厩图、牛舍图、侍从图和楼阁

图等, 西侧室入口南侧侍从上部发现7行68字的墨书题记 (原题记为竖排):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
 口丑使持節都督諸軍事
 平東將軍護撫夷校尉樂浪
 相昌黎玄菟帶方太守都
 鄉侯幽州遼東平郭
 都鄉敬上里冬壽字
 口安年六十九薨官

墓中还发现“帳下督”“门下拜”“記事”“小吏”“省事”“井”和“碓”等朱书题记。根据墓志内容可知墓葬为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冬寿墓, 冬寿亦作佟寿, 336年由前燕逃奔高句丽。由于墓葬早年被盗, 仅出土陶罐、铁钉和铁矛等遗物。



图一 冬寿墓平、剖面图及结构示意图
1. 冬寿墓平、剖面图 2. 冬寿墓结构示意图

二、冬寿墓的莲花纹

冬寿墓前室和后室之间有三根八角形石柱和一根四角形石柱(四角形石柱位于三根八角柱东侧)、后室及北面的回廊之间有三根八角形石柱和两根四角形石柱(四角形石柱位于三根八角柱两侧), 除前室和后室之间东侧四角柱、后室与北回廊之间东侧的四角石柱上有一斗二升外, 其他石柱上均直接承接栌斗, 栌斗正面均绘有兽面纹, 前室和后室之间立柱栌斗的两侧绘有莲花纹。墓室天井部均为“三角叠涩2层+大型盖顶石”结构。

冬寿墓莲花纹位于前室西侧室西壁冬寿坐帐两角及顶部(图二, 1)、南壁冬寿夫人坐帐两角及顶部(图二, 2), 前室与后室之间四个立柱栌斗的东西侧面, 后室天井顶部。除后室天井部莲花纹为俯视莲花纹外(图三, 7), 其余莲花纹均为侧视的莲花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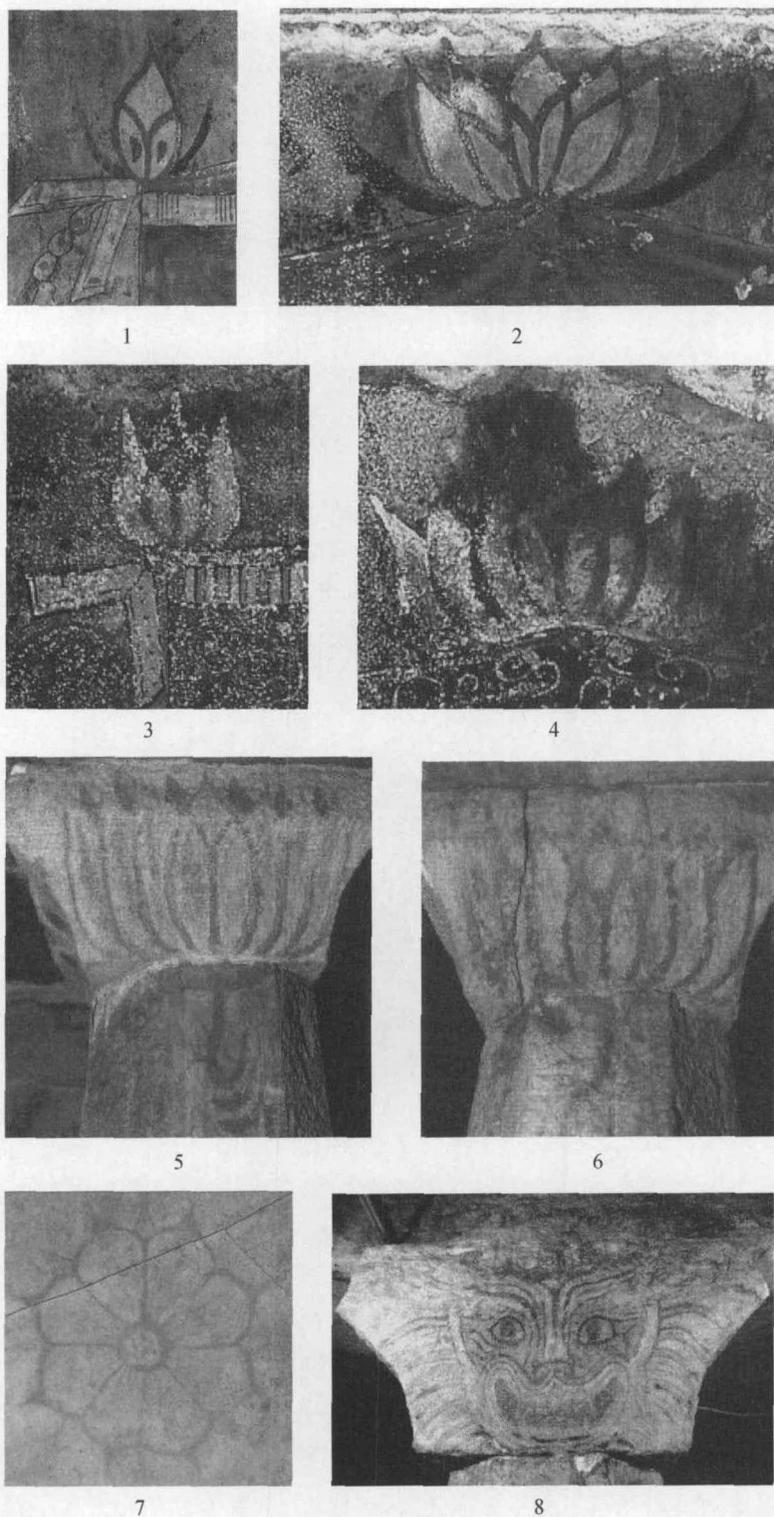


2

图二 冬寿墓坐像

1. 前室西侧室西壁冬寿坐像 2. 前室西侧室南壁冬寿夫人坐像

或莲蕾。侧视的莲花纹莲瓣数量有三瓣、五瓣和七瓣三种，其中三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夫人坐帐两角（图三，3），五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坐帐顶部（图三，2），七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夫人坐帐顶部（图三，4）、前室和后室立柱栌斗的两侧（图三，5、6）。莲蕾见于冬寿坐帐两角（图三，1）。莲花纹绘制时使用的颜料有白色、红色、黑色和黛青色，其中冬寿坐帐两角及顶部的莲花纹以红色颜料绘制莲花轮廓，莲瓣内填有白色颜料，莲花和莲蕾底部以黛青色颜料绘制莲叶和莲蕾上的装饰；冬寿夫人坐帐两角及顶部的莲花纹同样是以红色颜料绘制莲花轮廓，莲瓣内填有白色颜料；前室与后室之间西起第一立柱栌斗两侧以红色颜料勾勒莲花轮廓，相邻莲瓣间以黛青色颜料绘出莲叶末端，



图三 冬寿墓莲花纹及兽面纹

1. 冬寿坐帐两角的莲花纹 2. 冬寿坐帐顶部莲花纹 3. 冬寿夫人坐帐两角的莲花纹 4. 冬寿夫人坐帐顶部莲花纹
5. 前室和后室之间西起一柱东侧莲花纹 6. 前室和后室之间西起第二柱东侧莲花纹 7. 后室天井顶部莲花纹
8. 前室和后室之间西起第一柱正面兽面纹

栌斗下的立柱的上部绘有部分莲叶及莲花的柄部；其余栌斗两侧的莲花仅以墨线勾勒轮廓，没有使用其他颜料，栌斗下的立柱上端也没有绘出莲叶及莲花的柄部；后室天井顶部的莲花则是以红色颜料绘出上层莲瓣和莲蓬，上层相邻莲瓣之间以墨线绘出下层莲瓣。由于冬寿坐帐两角及顶部莲花纹、冬寿夫人坐帐两角及顶部莲花纹、前室和后室之间西起第一立柱栌斗莲花纹红色轮廓线附近存在墨线，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莲花纹的绘制过程应是先以墨线起稿，其次以红色颜料绘出莲花纹轮廓，再次在莲瓣和莲蕾中填以白色颜料，最后以黛青色颜料绘出莲叶、莲花柄部和莲蕾上的装饰；西起第二至第四立柱栌斗上的莲花纹仅以墨线勾出轮廓；后室天井顶部的双层莲花纹莲瓣线附近没有发现墨线起稿的痕迹，其绘制方法应是直接用红色颜料绘制上层莲瓣及莲蓬，再以墨线绘制出下层莲瓣。栌斗正面的兽面（图三，8）形制略有差异，其中西起第二立柱和西起第四立柱栌斗上的兽面纹的下端部分绘制于栌斗下立柱的上部。

三、冬寿墓莲花纹的研究

在研究冬寿墓莲花纹之前，我们首先对冬寿的经历作一介绍。根据墨书墓志记载357年10月69岁的冬寿去世，依此推算冬寿当生于288年或289年^[4]，冬寿在逃往高句丽之前，曾经是前燕的司马。东晋咸和八年（333年）五月被东晋朝廷封为辽东郡公的慕容廆去世，六月慕容廆第三子慕容皝嗣辽东郡公，由于即位之初用法严苛等引起了慕容皝的弟弟慕容仁等的不满，当年十月慕容仁引兵征讨慕容皝，慕容皝随即以高诩、慕容幼、慕容稚、慕容军、慕容汗、司马冬寿等率军讨伐慕容仁。后慕容皝兵大败，慕容幼、慕容稚、慕容军被慕容仁俘获，由于冬寿曾为慕容仁司马，遂降于慕容仁。咸和九年（334年）十月至十一月慕容皝征讨辽东并多次击败慕容仁。咸康二年（336年）正月慕容皝亲率大军踏冰越海击败慕容仁并将其赐死，冬寿与郭充等逃往高句丽。咸康八年（342年）十一月慕容皝大举进攻高句丽，攻破丸都山城，俘虏高句丽故国原王王后、王太后等，发故国原王之父美川王之墓并载其尸体而还。永和十三年（357年）十月冬寿去世。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333年十月之前冬寿曾经做过慕容仁的司马，333年十月作为慕容皝的司马讨伐慕容仁，兵败后降于慕容仁，336年正月慕容皝击败慕容仁后冬寿逃往高句丽。冬寿到高句丽以后的活动由于各种文献并无相关记载，其具体经历不详，但是从342年高句丽经历的惨败来看，冬寿可能并未经历这场战争而是在其逃到高句丽以后被派往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地区，而且从其墓葬规模和内容等来看，冬寿应当受到了高句丽王室的重用。

公元357年的高句丽与前燕接壤，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高句丽又与前秦相邻，384年后燕建立后高句丽又和后燕接壤。以前燕、前秦和后燕等为代表的十六国政权无一例外的实行了支持和发展佛教的政策。但是对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认

为372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5]。第二种观点,根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认为不晚于357年的4世纪中叶佛教传入高句丽地区^[6],甚至认为冬寿本人可能也是佛教信徒^[7]。第三种观点,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314~366年)与“高丽道人书”的记载,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因此在366年之前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8]。第四种观点,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关于县始的记载等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376~396年在位,太元二十年即395年)佛教由东晋僧人县始传入高句丽^[9]。其中第一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以上各种观点基本上是以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为基础,并没有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因此我们将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的记录见于南朝梁代僧人慧皎(497~554年)撰写的《高僧传》(又称《梁高僧传》),该书实际上是东汉永平年间至南朝梁代天监时期著名僧人的传记,成为以后历代《高僧传》的范本。《高僧传》卷第十记:释县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驪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唐代西明寺沙门释道世(?~683年)于总章元年(668年)完成的《法苑珠林》卷三十一记:宋伪魏长安有释县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驪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所撰《北山录》卷三记:晋县始,孝武末(东晋也,帝临位,深奉佛法,苻坚兵至,谢玄破也)适辽东,高丽开导始也。后还三辅(三辅,咸阳县,昔秦皇于此置殿观),三辅人宗仰之。

元初无名氏所撰《神僧传》卷二记:释县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我们可以看到自慧皎撰《高僧传》以后,中国历代有关县始的记录或是直接援引,或是稍加归纳,并无多大出入,可以确定慧皎撰《高僧传》是以后各种记录县始史料的祖本。对于县始的籍贯都说明了是关中,县始到达高句丽的时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年)之末,由于中国文献没有说明县始到达高句丽的具体时间,仅知是太元之末。太元时期有21年,如果分成三期的话,太元之末大体为390~396年,此时关中地区正是后秦(384~417年)的势力范围,后秦和后燕相邻,而后燕通过辽东与高句丽接壤^[10](图四);而且《高僧传》等多提及县始“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说明县始可能是从关中出发前往高句丽的,以后又返回关中;至于《高僧传》所记县始活动均以东晋年号纪年,我们认为这与东晋南朝时期偏安长江以南的东晋南朝上自皇族、下至一般的士大夫始终是正统自居有关,而且慧皎本身就是南朝的僧人。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后秦关中僧人县始可能通过陆路由关中到达辽西,经辽东到达高句丽。



图四 十六国时期后秦、后燕和高句丽位置图

朝鲜史书中三部成书于高丽王朝的《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对佛教传入高句丽均有记载。《三国史记》为金富轼（1075~1151年）奉旨编纂，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成书，《三国史记·卷第十八·小兽林王本纪》记：二年（372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四年（374年）僧阿道来。五年（375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海东高僧传》为高丽僧人觉训奉旨撰写，成书于高丽高宗二年（1215年）。全书共有两卷，其中第一卷前有“流通一之一”叙述佛教产生、传入中国、朝鲜半岛的过程及成书原因，另有顺道、昙始及阿道等僧人传记。《海东高僧传·卷一·流通一之一》记：若我海东，则高句丽味留王（应为解味留王，即小兽林王，笔者注）时，顺道至平壤城。继有摩罗难陀从晋来于百济国，则枕流王代也。后于新罗第二十三法兴王践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来止一善县。

《海东高僧传·卷一·顺道》记：释顺道，不知何许人也。迈德高标，慈忍济物，誓志弘宣，周游震旦，移处就机，海人不倦，高句丽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苻坚（应为苻坚，笔者注）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敬信，感庆流行，寻遣使回谢，以贡方物。或说顺道从东晋来，始传佛法，则秦晋莫辨，何是何非。……后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文），始创省门寺以置顺道，古记云以省门为寺，今兴国寺是也，后讹写为省门。又并伊弗兰寺，以置阿道，古记云兴福寺是也。此海东佛教之始。

《海东高僧传·卷一·昙始》记：释昙始，关中也，自出家多有异迹。足白于面，虽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以晋太元末年赍持经律数十部往化辽东，乘机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梁僧传以此为高句丽闻法之始，是当广开土王五

年(应为六年,即396年,笔者注)、新罗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济阿莘王五年,而秦苻坚(应为苻坚,笔者注)送经像后二十五年也。……晋义熙初师复还关中,唱道三辅。

《海东高僧传·卷一·阿道》记:释阿道,或云本天竺人,或云从吴来,或云自高句丽入魏,后归新罗,未知孰是。风仪特异,神变尤奇,但以行化为任,每当开讲,天雨妙花始。新罗讷祗王时有黑胡子者从高句丽至一善郡,宣化有缘郡人毛礼,家中作窟室安置。于是梁遣使赐衣着香物。

《三国遗事》为高丽王朝僧人一然(1206~1287年)撰写,书中记录的最晚年代为1281年,依此推算应完成于1281~1287年。《三国遗事·卷三·兴法第三》记:“顺道肇丽。”高丽本记(应为纪,即《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笔者注)云:小兽林王即位二年(372年)壬申,乃东晋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时坚都关中,即长安)。又四年(374年)甲申,阿道来自晋。明年(375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僧传(《海东高僧传》)作二道自魏云者误也,实自前秦而来。又云肖门寺今兴国,伊弗兰寺今兴福寺者亦误。

以上三部高丽王朝的史书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记载各有特点,三部史书均认为372年由前秦僧人顺道将佛教传入高句丽,其中《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未提及县始;《海东高僧传》不但提及县始到高句丽弘法之事,而且给出明确年代(396年);以上记载究竟源于何处,由于在中国早期史料中并未找到相关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史料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慧皎撰写的《高僧传》记载比较可信,高丽王朝的三部史书在涉及顺道、阿道及县始的相关记载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与此相对的是,统一新罗末期由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年)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全称《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寄照之塔碑铭并序》)中却提到了有关佛教传入高句丽的事情。《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11](图五)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加恩邑院北里凤岩寺,为韩国宝物第138号,碑高2.73米、宽1.64米、厚0.23米,螭首龟趺,碑阴末有“龍德四年歲次甲申六月□□日竟建”的题记,龙德为五代时期后梁年号,龙德四年即924年,该碑开始部分还叙述了佛教诞生及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

该碑第3列下端碑文部分残损,在清朝金石学家刘喜海1832年完成的《海东金石苑》和朝鲜总督府1918年编写的《朝鲜金石总揽》(上)中均没有完整释文,1919年朝鲜学者李能和编写的《朝鲜佛教通史》(上)中首次披露了完整释文。第3列末段:“昔當東表鼎峙之秋,有百濟蘇塗之儀,若甘泉金人之祀,(厥後西晉曇始始之貊,如)。”第4列上段:“攝騰東入,句驪阿度度于我,如康會南行。”其中李能和第3列释文括号中部分,刘喜海《海东金石苑》释文为“□□西□□□□□”,朝鲜总督府《朝鲜金石总揽》(上)的释文为“□□西□□□于□如”。崔致远虽然误将县始所处的时代说成西晋,但却记录了县始入高句丽传法的事实。碑文中“曇始始之貊,如攝騰東入”,即是说县始到达高句丽,如同东汉明帝时到达洛阳的西域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



图五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照片及正面碑文拓片
1.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 2.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正面碑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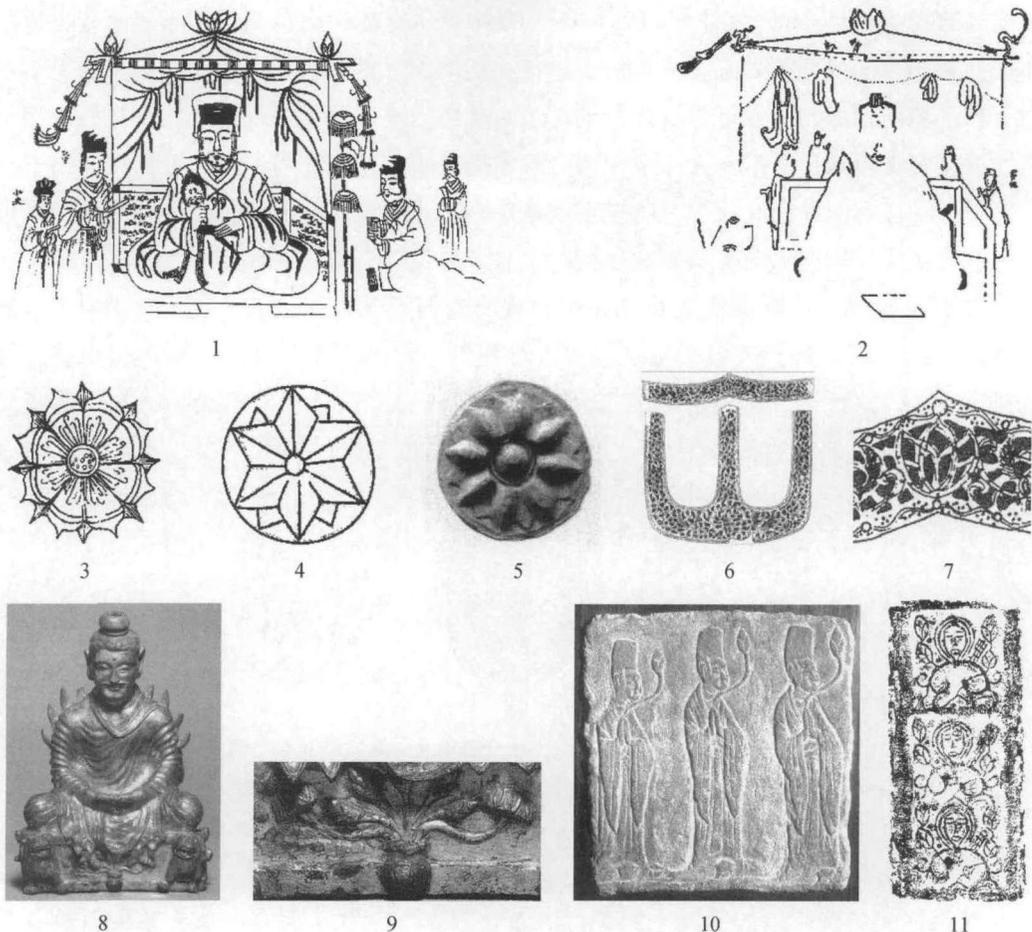
一样，使佛教开始在高句丽地区传播。唐代高句丽人也自称高句丽为貊，这一点可以从高句丽灭亡后居住在唐朝的泉男生之子泉献诚的墓志（大足元年，701年）中得到证明：“君諱獻誠，其先高句麗國人也。……公即襄公嫡子也。生於小貊之鄉，早有大成之用，地榮門寵，一國罕儔。”因此参考包括慧皎《高僧传》在内的中国史料及崔致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我们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390~396年）由后秦关中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的作者在编写过程并未参照《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所记载的内容。至于《高僧传》所记载的与东晋僧人支道林（314~366年）书信来往的“高丽道人”虽然在《海东高僧传》也有相关记载，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位“高丽道人”就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

在探讨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何时出现的问题时，弄清冬寿墓莲花纹的渊源是非常必要的。冬寿墓的莲花纹根据其形态不同大体可分三型，A型即莲蕾形莲花纹，见于冬寿坐帐两角；B型即双层八瓣莲花纹，见于后室天井部；C型即侧视莲瓣形莲花纹，依据其莲瓣数量的多少又可分三型：Ca型即侧视三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夫人坐帐两角；Cb型即侧视五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坐帐顶部；Cc型即侧视七瓣莲花纹，见于冬寿夫人坐帐顶部、前室和后室之间立柱栌斗的两侧，其中Cc型侧视七瓣莲花纹在莲瓣形态上

又有一些差异。由于冬寿是由前燕逃亡到高句丽的,而且当时前燕与高句丽领土接壤,因此我们首先来看前燕或三燕时期的莲花纹。三燕时期的壁画墓由于发现数量不多和保存情况不好等原因,目前还没有发现与冬寿墓莲花纹相同的图案,但是在朝阳地区出土的一些三燕遗物上发现了与冬寿墓莲花纹类似的纹样。

冬寿墓的B型莲花纹(图六,3)与朝阳袁台子壁画墓(354或366年)出土的小铜铃^[12](图六,4)和朝阳老城出土的前燕时期莲花纹瓦当^[13](图六,5)上的图案比较相似。喇嘛洞三燕墓地采集的鎏金铜箭箠上发现了与冬寿墓Ca型莲花纹相似的纹样(图六,6、7),由于箭箠为采集品,准确断代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可以确定是三燕时期的遗物。十六国北朝时期曾经流行以莲花或流苏等装饰坐帐,《邺中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与此类似的帐在北朝时期也曾作为太极殿的装饰,《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列传》即有:“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冬寿墓的坐帐、帐顶及帐角装饰莲花和流苏(图六,1),与辽阳上王家村晋墓^[14]壁画中男主人的坐帐(图六,2)十分相似。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存在着粉本,而粉本存在着被多次借用、复制、选择、组合、改造的问题^[15]。田立坤先生通过对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冬寿墓和德兴里壁画墓墓主人形象的对比认为魏晋十六国时期辽西和朝鲜半岛墓葬壁画可能流行一种相同的粉本^[16]。由于冬寿墓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与辽西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认为冬寿墓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实际上是利用、复制后者壁画中的某些片段为粉本,同时还存在着根据墓主人身份等对粉本进行选择、组合和改造的情况。与辽阳上王家村晋墓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对比,我们发现冬寿墓帐角上出现有莲蕾形莲花,另有璜、珠子和流苏装饰;上王家村晋墓帐角上没有莲花,仅有龙衔流苏的装饰;这些变化可能暗示了墓主人身份的差异,郭大顺先生认为上王家村晋墓使用了龙衔流苏的装饰,其墓主人是与中原地区诸侯王级别相当的辽东的公孙氏^[17]。冬寿墓的莲花纹及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只能视为一种装饰纹样,并不代表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18]。虽然冬寿墓A型莲花纹(即莲蕾形莲花纹)在目前三燕地区并未发现相似的图案,但是莲蕾形莲花纹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上已经发现,如传河北省石家庄出土,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鎏金铜佛是十六国早期典型的佛教造像(图六,8),其年代大体在4世纪初,也有学者认为年代在4世纪前半叶^[19],佛像结跏趺坐,位于狮子形方形台座上,台座中间有一圆形宝瓶,宝瓶的插花中即有莲蕾形莲花(图六,9);莲蕾形莲花纹在随后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中^[20](图六,10)也非常流行;与北方相比,南方的莲蕾形莲花纹可能出现更早,盱眙县发现的与佛教有关的西晋太康九年(288年)花纹砖上已经存在此类纹样^[21](图六,11);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今后三燕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与冬寿墓相似的莲蕾形莲花纹应该可以在三燕地区发现。



图六 冬寿墓壁画、辽阳上王家村晋墓壁画及相关莲花纹

1. 冬寿墓主人像 2. 辽阳上王家村晋墓主人像 3. 冬寿墓后室天井莲花纹 4.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铜铃纹样
5. 朝阳老城出土莲花纹瓦当 6、7. 喇嘛洞采集鎏金铜箭箠及其莲花纹 8、9. 十六国时期鎏金铜佛及台座宝瓶中的莲蕾形莲花 10. 天龙山石窟北朝礼佛图 11. 西晋太康九年(288年)花纹砖纹样

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出现在集安地区,时间在迁都平壤(427年)之前,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关于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出现在集安的哪个遗址,具体什么时候出现仍是不得而知。因为冬寿坐帐两角出现了莲蕾形莲花(即A型莲花纹),诸多日韩学者,如田村晃一^[22]、东潮^[23]、金希燦^[24]和白种伍^[25]均据此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是受冬寿墓莲蕾形莲花纹的影响而出现的,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应是太王陵出现的莲蕾形莲花纹瓦当,时代大体在4世纪后期。由于集安地区高句丽墓葬和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风格完全不同,即墓葬出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遗址出土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因此我们在研究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起源问题时将从高句丽墓葬和遗址两个方面分别着手。

集安地区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墓葬主要有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西大墓^[26]、禹

山墓区2112号墓^[27]和上和龙5号墓^[28]等,其中对研究高句丽莲花纹瓦当起源有决定性作用的墓葬为千秋墓和太王陵。千秋墓莲花纹瓦当为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太王陵不但有和千秋墓相似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而且还出现了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将军坟的莲花纹瓦当则全部是与太王陵相似的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此外千秋墓还出土了高句丽最晚形态的卷云纹瓦当,所以千秋墓是高句丽卷云纹瓦当消失、莲花纹瓦当出现的标志性墓葬。国内城时期集安地区同类型莲花纹瓦当莲瓣的数量越来越多^[29],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同类型莲花纹瓦当表现出六瓣至八瓣的变化(图七,1~4);同时就莲花纹瓦当的直径来看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出土莲花纹瓦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30];因此就瓦当的发展演变关系而言我们认为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是前后相继的。



图七 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莲花纹瓦当及千秋墓“永樂”铭文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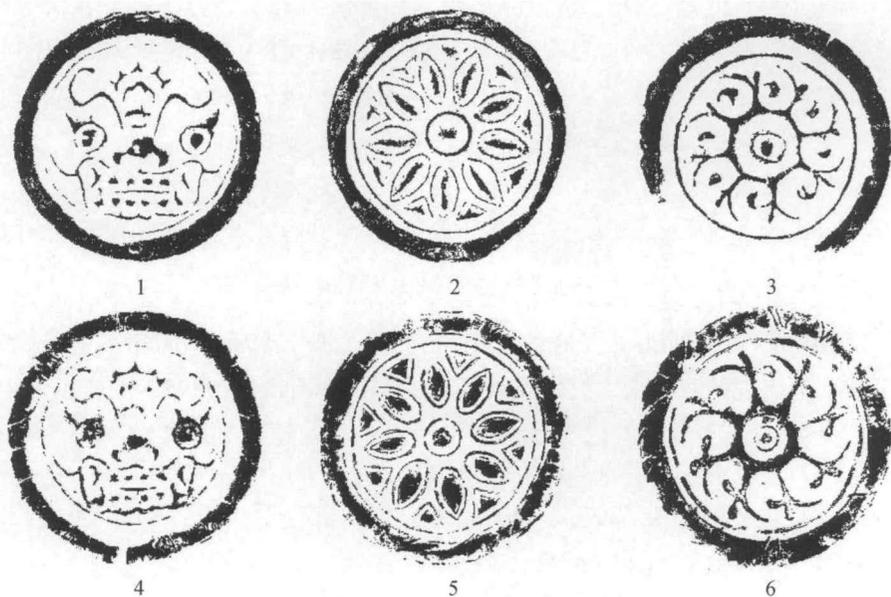
1. 千秋墓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 2. 太王陵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 3. 太王陵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
4. 将军坟双界格八瓣莲花纹瓦当 5. 千秋墓出土“永樂”铭文筒瓦

根据好太王碑(第四面第七列第八列):“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惟國罍上廣开土境好太王盡為祖先王墓上立碑,銘其煙戶不令差错。”^[31]说明好太王时期曾经为祖先先王立碑,其中也应包括对“陵寝建筑”的修缮,千秋墓出土的“永樂”铭文筒瓦及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应当是好太王修陵的产物。

“永樂”铭文筒瓦有“(樂)浪趙將軍口,(乙或丁)未在永樂”^[32]的铭文(图七,5),好太王在位时间为391~412年,干支纪年中有“未”年份有“乙未”(395年)和“丁未”(407年),说明好太王在乙未年(395年)或丁未年(407年)曾经修缮千秋墓,即千秋墓上出现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的年代为乙未年(395年)或丁未年(407年)左右。千秋墓仅出现一种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也否定了太王陵出现的其他瓦当(如莲蕾形莲花纹瓦当)是最早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可能性,因为如果太王陵其他莲花纹瓦当早于千秋墓上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那么好太王在修缮千秋墓时必然也会使用其他类型的莲花纹瓦当。

集安地区出土瓦当的遗址主要有丸都山城宫殿址、瞭望台遗址^[33]和东台子遗址^[34]等。其中对研究高句丽莲花纹瓦当起源有决定性作用的遗址为丸都山城宫殿址和东台子遗址。通过对丸都山城宫殿址地层、出土遗物和相关文献等的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发掘的丸都山城宫殿址是好太王十七年(407年)二月“增修宫阙”的结果^[35],瓦当的

年代上限应在407年左右。方起东先生^[36]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建筑结构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九年（392年）三月下令修建的国社宗庙遗迹。韩国学者姜贤淑^[37]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出土瓦当和带饰等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的时代在5世纪末以后、渤海灭亡之前。迁都平壤以后各种文献史料均不见高句丽王在国内城活动的记载，也未见在国内城地区有大规模建设的纪录，与此相对的是《三国史记》中却记载了迁都平壤以后先后有安藏王（521年）、平原王（560年）和荣留王（619年）三位高句丽国王到卒本地区祭祖。如果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在国内城地区修建东台子如此规模庞大的建筑，史料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也确实不符合常理。加之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瓦当均表现出高句丽国内城时期的特点。因此我们同意方起东先生的观点并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三月^[38]下令修建的国社宗庙遗迹，但是当年五月故国壤王去世，可能由于东台子建筑当时并未最终完成，也就没有使用瓦当。如果故国壤王时期修建的国社宗庙使用瓦当，应是与其千秋墓（故国壤王之墓）上发现的卷云纹瓦当类似的瓦当，可见东台子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瓦当并非故国壤王时期的遗物，应是好太王时期在修缮过程中使用的瓦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好太王碑碑文中记载的好太王时期曾经为上祖先王墓立碑中得到提示，在此过程中修缮上祖先王墓和宗庙社稷亦在情理之中，更何况故国壤王时期下令修建的国社宗庙可能还未完工。而且东台子遗址出土的部分瓦当（图八，4~6）与丸都山城宫殿址部分瓦当（图八，1~3）相同或相似，因此我们认为东台子遗址出土瓦当的年代上限也应在407年左右。



图八 丸都山城宫殿址及东台子遗址高句丽瓦当
1~3. 丸都山城宫殿址出土瓦当 4~6. 东台子遗址出土瓦当

通过对集安地区高句丽墓葬和遗址出土瓦当的梳理,可以知道最晚在好太王十七年(407年)左右高句丽已经出现了莲花纹瓦当,千秋墓上发现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可能是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通过对千秋墓出土“永樂”铭筒瓦等分析我们认为千秋墓“永樂”铭筒瓦的年代可能为好太王时期的丁未年(407年)。

四、结 语

冬寿墓莲花纹作为目前高句丽壁画墓中发现的最早的莲花纹,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同时研究冬寿墓莲花纹对于探讨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和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何时出现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中国古代及朝鲜半岛相关史料的分析,我们认为东晋太元之末(约390~396年)后秦关中僧人昙始将佛教传入高句丽,昙始当时可能由陆路从关中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及坐帐形象应是直接源于汉魏十六国时期的辽西壁画墓,并对以后的高句丽壁画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冬寿墓的莲花纹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仅仅是作为一种与坐帐共存的装饰纹样,并不代表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可能是千秋墓上发现的双界格六瓣莲花纹瓦当,其年代可能在好太王时期的丁未年(407年)左右。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应是佛教传入高句丽以后的产物,同时还与三燕莲花纹瓦当关系密切。

注 释

- [1] 国内部分学者或认为冬寿墓应属于辽西三燕墓葬系统,见田立坤,张克举.前燕的甲骑具装[J].文物,1997(11):72—75.或认为冬寿墓属于中国汉人血统的乐浪人或流亡汉人的墓葬,见:孙进己,孙泓.公元3~7世纪集安与平壤地区壁画墓的族属与分期[J].北方文物,2004(2):36—43.
- [2] 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2(1):101—104.
- [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安岳三号墓发掘报告[M].平壤:科学院出版社,1958.
- [4] 现在人们计算死者的年龄时是以虚岁计算,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比实际年龄多出一岁,对于生活在冬寿时代的高句丽人在计算死者年龄时是以虚岁计算还是以实际年龄计算,我们并不知道.因此如果当时以实际年龄来计算冬寿的年龄,则冬寿生于288年;如果当时以虚岁计算冬寿的年龄,则冬寿生于289年.
- [5] a.魏存成.高句丽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74.
b.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A].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33—246.朝鲜学者及韩国学者也基本持这一观点.
- [6] 梁志龙.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J].北方文物,2004(2):88—94.

- [7] 吴焯.从相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J].中国史研究,2006(1):69—80.
- [8] 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J].北方文物,2001(2):32—38+70.
- [9] [日]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县始与高句丽佛教[J].博物馆研究,2002(2):38—44.
- [10] 图三采自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28,附十六国.
- [11] 本文图六照片及拓片均采自成均馆大学博物馆,新罗金石文拓片展(韩文)[M].首尔:成均馆大学博物馆,2008:119—121.
- [1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J].文物,1984(6).田立坤先生通过对墓中题记和壁画等的研究认为袁台子壁画墓的年代为354年或366年,见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J].文物,2002(9):41—48.
- [13] 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A].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12.
- [14] 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J].文物,1959(7):60—63.
- [15]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67.
- [16] 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J].文物,2002(9):41—48.
- [17] 郭大顺.《辽阳壁画墓群》学习笔记[A].东北亚考古学论丛[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0—34.
- [18] 王飞峰,夏增威.高句丽丸都城瓦当研究[J].东北史地,2008(2):67—74.
- [19] 玛丽琳·M·丽爱(著),台建群(译).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塑像的关系[J].敦煌研究,1992(1):26—34.
- [20] 孙迪.天龙山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 [21] 秦士芝.盱眙县发现一批西晋墓砖[A].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26、127.
- [22] 田村晃一.楽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日文)[M].東京:同成社,2001:313—320.
- [23] 東潮.高句麗考古學研究(日文)[M].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九年(1997):115.
- [24] 金希燦.4世纪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开始年代(韩文)[J].韩国思想和文化(第45辑)2008:107—144.
- [25] 白种伍.高句丽瓦的成立和王权(韩文)[M].首尔:周留城出版社,2006:253—255.
- [26] 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和西大墓出土瓦当资料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以下称集安高句丽王陵[M].
- [27] a. 集安市博物馆.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J].北方文物,2004(2):29—35.
b.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禹山M2112墓室清理报告[A].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92—299.
- [28]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上、下活龙村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4(1):64—70.

- [29] 王飞峰, 夏增威. 高句丽丸都山城瓦当研究 [J]. 东北史地, 2008 (2): 67—74.
- [30] 千秋墓莲花纹瓦当的直径为15.6~16.6厘米, 太王陵莲花纹瓦当直径为16~21.6厘米, 将军坟莲花纹瓦当直径为16~22厘米.
- [31] 本文所用好太王碑文采用方起东先生释文, 见集安高句丽王陵 [M].
- [32] 此处释文据集安高句丽王陵 [M] 释文, 但也有学者释为“(樂)浪趙將軍, □夫任永樂”, 见井上直樹. 集安出土資料からみた高句麗支配体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J]. 朝鮮學報, 第二百三輯, 平成十九年(2007): 1—40. 由于“□未在永樂”中“未”字上面一字残损, 集安高句丽王陵 [M] 认为可能是“乙未”(公元395年)或“丁未”(公元407年). 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 [M]: “死者, 殓在屋内, 经三年, 择吉日而葬. 居父母及夫丧, 服皆三年, 兄弟三月.” 说明高句丽人死后, 经三年, 才正式安葬尸体. 禹山3319号墓曾出土“乙卯”铭, “丁巳”铭的卷云纹瓦当, 根据出土青瓷及墓葬形制等其年代在4世纪中叶, “乙卯”为公元355年, “丁巳”为公元357年. 禹山3319号墓的相关资料, 见孙仁杰. 通沟古墓群禹山墓区3319号墓发掘报告 [J]. 东北史地, 2005 (6): 19—31. 笔者认为禹山3319号墓的“乙卯”(355年)铭瓦当为墓主人死后修建墓葬时制作的瓦当, “丁巳”(357年)铭瓦当为三年之后埋葬墓主人时制作的瓦当. 此外根据好太王碑碑文可知, 好太王死于公元412年, 好太王碑的立碑时间在公元414年, 即好太王死后三年, 长寿王安葬了父亲好太王并为其立碑. 千秋墓为故国壤王的陵墓, 故国壤王死于公元391年, 三年之后即公元393年好太王安葬了父亲故国壤王. 公元393年到好太王“乙未”年(395年)仅有三年, 在没有发生地震和火灾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好太王“乙卯”年没有必要修缮千秋墓. 从千秋墓及其周围区域的发掘结果来看, 当时没有发生地震和火灾等自然灾害. 而好太王“丁未”年(407年)距故国壤王安葬(393年)已有15年, 存在修缮的可能性. 筒瓦“未”字上面一字虽然残损, 但留有短小的“丿”形痕迹, 对照好太王碑的“永樂五年, 岁在乙未”, 和“十七年丁未”, 笔者认为“未”字上面一字是“丁”字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笔者倾向于筒瓦的年代为“丁未”(407年), 即筒瓦的铭文为“乐浪赵将军”“丁未在永樂”.
- [33] 丸都山城宫殿址和瞭望台遗址出土瓦当资料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 丸都山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34]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 [J]. 考古, 1961 (1): 50—55.
- [35] 王飞峰. 关于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几个问题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0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316—325.
- [36] 方起东. 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 [A]. 东北考古与历史 (第一辑)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85—88.
- [37] 姜贤淑. 中国吉林省集安东台子遗迹再考 (韩文) [J]. 韩国考古学报, 第75辑, 2010: 170—199.
- [38] 三国史记·卷第十八·故国壤王本纪 [M]: “九年(392年)……三月, 下教, 崇信佛法求福. 命有司立国社, 修宗庙.” 三国史记 [M] 所记故国壤王在位年代为384~392年, 实际

上依据好太王碑和太王陵出土铭文铜铃等资料故国壤王在位年代为384~391年，因此笔者倾向于东台子建筑为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三月下令修建的高句丽国社宗庙遗迹。由于三国史记 [M] 在故国壤王纪年问题上多出一年，因此本文在涉及故国壤王和好太王年代时均做了调整。

Study on Decorative Pattern of Lotus in Dongshou Tomb

Wang Feifeng

As far as we know, Dongshou Tomb is the earliest Koguryo mural tomb for now, and mural have various decorative pattern of lotus. Studying on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when Buddhism got in Koguryo and when lotus tile-end produced in Koguryo.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Chinese history records and Korean history records, we have reasons to think tha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aiyuan (about 390—396) of Eastern Jin famous monk Tanshi coming from Guanzhong area of Hou Qin propagated Buddhism to Koguryo. At that time, Tanshi might set out from Guanzhong and arrive in Liaoxi by land route, after that, pass though Liaodong and arrive at Koguryo. The decorative pattern of lotus in Dongshou Tomb is just a kind of decorative pattern, and doesn't mean Buddhism had already arrived in Koguryo. Koguryo lotus tile-end is a result of Buddhism arrived in Koguryo.